

论黎族作家群在新世纪的崛起

郭 蕤

内容提要： 在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群中，黎族作家群的地域元素及特色较为鲜明。其族群与文化具有相对严密的封闭性与自主性。这个性格鲜明的作家群，在努力保持丰富文化遗产的同时，亦自觉地无意识地融合了汉语思维、汉语言及观念因素。黎族作家应在黎语思维与汉语表达之间，寻找一种不同民族文化表现之间的互通交融。黎族作家的群体意识已经形成，这与一些重大的经济与文化事件的促成及刺激相关。黎族作家群烙印着一个民族从原始文化、口头文学到现代文明、作家文学这一进程的精神印迹。

关键词： 民族文学 民族文化 黎族作家 原始文化 现代文明

在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群中，黎族作家群的地域元素及特色较为鲜明。黎族聚居在海南岛，其族群与文化具相对严密的封闭性与自主性。文化与文学流变的线索，直接、清晰，源流有序。但因其封闭性，也造成文化骨力不足，在面对文化入侵时，其抵抗是乏力的，迅速被外来文化所改造。从这点看，黎族文化的自主性，有着开放的姿势。在新形势下，黎语的衰竭及汉语的普及，汉语取代黎语方言而迅速成为新一代人的母语现象，非常普遍，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将改变或转向黎族文化、文学的原始风格。这个性格鲜明的作家群，在努力保持丰富文化遗产的同时，亦自觉地无意识地融合了汉语思维、汉语言及观念因素。

—

黎族有哈、杞、润、美孚、赛五个分支。每个分支都有自成体系的方言与习俗，各方言中又分若干个次方言（土语），这就形成了五大文化五大方言。有的方言基本无法互通，差别很大。哈方言人数最多，约占总人口的60%，大约八十万左右。杞方言人数次之，约占总人口24%，润方言人数较少，占6%左右，润方言有两个“土语”：白沙、元门。美孚方言和赛方言人数最少，比例均占5%。这种复杂的方言构成，既显示了黎族文化的多样性元素，同时也造就

了较为复杂的文学语言现象。这也是研究这个作家群时,必须注意的问题。

黎族文化在文学中的转化与表现,在这个作家群的文学创作中,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因为大多数作家是 60 后、70 后、80 后,他们对原始的民族文化及生活基本上是隔阂的,对原始文化了解不多,有的连黎语都不会讲。其文学创作与汉族作家几乎无异。二是海南岛在长期经济建设及政治运动中,黎族文化受到严重破坏,黎族的文化生活被全新的东西包括习俗置换了,可说是脱胎换骨。其作品从题材到创作心理,很少感受到黎族文化元素。三是作家的民族情结较重,文化自觉却很淡薄。这种矛盾性有太多的现时功利,自然也影响对民族灵魂表达的文学探究。

黎族作家的群体意识已经形成,这种形成有强烈的年代性,也与某些重大的经济与文化事件的促成及刺激相关,海南旅游岛的建设契机,加速了黎族文化的现实流失,这种文化破坏促成了重建与重塑的文化欲望。此乃危机性动力之一。而重大的文学事件对之的影响就更为直接。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式的黎族作家文学研讨会迄今召开过三次。第一次是 1996 年 11 月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第 6 届年会期间,在位于通什的琼州大学举办,这可视为是这个作家群在萌芽之时的一次号召与集结。第二次是 2010 年 5 月,海南省作家协会在澄迈举办当代黎族文学研讨会,这一次人数较多,参与人员也更广泛,可视为这个作家群已成雏形。此后几年,黎族作家队伍迅速扩张,作品出版数量倍增。第三次是 2014 年 7 月 27 日,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第 12 届年会在三亚南田召开期间,特意主办黎族作家文学专题研讨会。与会黎族作家达三十人左右,是历届参会人数最多的,几乎每位作家都有多部作品出版。黎族作家群已然形成。与会作家 60% 以上来自黎语区域,会讲黎语方言,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为黎族文化研究学者,如王海、高泽强、叶传雄等。这个作家群在阵容乃至内涵上都充分体现了黎族的文化特征。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第 12 届年会期间举办的黎族作家文学研讨会,对于学会而言,也许仅仅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学术活动,但对于海南岛的黎族文学作家而言,却有着不同凡响的意义。它意味着黎族作家群已经形成,黎族作家文学已经初具规模,这次会议成为黎族作家文学的一个里程碑。应邀参会的黎族作家将近 30 位,大多是改革开放以来成长起来的中青年作家。这是一个年青的、创作力旺盛的黎族作家群。这个作家群,烙印着一个民族,从原始文化、口头文学到现代文明、作家文学这一进程的精神印迹。这种印迹体现着这个群体所特有的,由长期的历史文化熏陶而成的文学主体性,强烈的民族意识,自觉的文学诉求,饱满的话语冲动,张扬的地域情绪,期待获得他者承认的急迫欲望等等,使得这个群体爆发出一种主体的张力。这是一个亟待得到扶持与肯定的作家群。

二

黎族作家群的中坚人物,学者、作家王海,在题为《成绩与问题》的发言中,对这个作家群的形成,有很客观的描述:“黎族作家文学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之前没有作家书面文学。当代黎族作家文学的发展,按时序可划分为……三个阶段”^①。王海所论的黎族作家文学三个阶段,和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文学以其轰动效应不单张扬了文学本身,同时也使文学普及,启智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此时也是黎族作家文学的发轫期,首批黎族作家如龙敏、王海、王艺、董元培、马仲川、符玉珍等,依托《五指山文艺》,在文坛崭露头角。当时,位于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的广东民族学院中文系,既培养了一大批黎族文学工作者,又在编撰“三套集成”的工作中,发掘黎族口头文学,推动黎族作家文学的生成和发展。中文系的郭小东会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毛星、贺学君等人,在自治州作“三套集成”的调查,中文系77级、78级的同学全员参与,后来成为黎族作家领军人物的王海就是其中一员。由口头文学搜集记录整理到书面文学创作,黎族作家文学一开局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民间文学中吸取创作的原动力。

王海在1979年第3期《五指山文艺》发表了黎族文学史上第一篇短篇小说《采访》,这是黎族作家文学的开端。此后,符玉珍的散文《年夜饭》、龙敏的《年头夜雨》、黄学魁的《东方夏威夷》发表并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后来更名为“骏马奖”)。

20世纪90年代,是黎族作家文学的休整期,“文革”后第一批黎族大学生成为了这个创作群落中的主体力量,受过高等教育的黎族作家,有着对民族身分的自我辨析、对民族文化的寻根、对文学创作的热情与冲动,创作欲望强烈。但是,经历了海南建省、《五指山文艺》停刊、“海南汽车事件”等一系列社会、经济转型问题,黎族作家在现实面前的文学困惑,与80年代文学观念带来的冲击力一样多。当代文学创作的无所适从,迷茫无措的状态,在民族作家这儿,显得更为严重。这一时期,黎族作家的创作力受限,作品大多是篇幅短小的散文诗歌,少有对本民族或现实社会怀有深沉思考的作品问世。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家有亚根、高照清、黄学魁、黄照良、韦海珍等。上述这些作家在90年代有一段时期的蛰伏,包括在80年代崛起的王海与龙敏,在90年代都没有大的文学作为。不过,世纪末的焦虑,也是这个作家群最终能够获得新生的契机。

^① 王海:《成绩与问题》,在海南三亚“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第12届年会暨黎族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黎族作家群得以迅速整合的年代。除了上述的作家们陆续奉出新作外,黎族作家队伍迅速扩张壮大:郑文秀、唐岫、李其文、谢来龙、唐鸿南、叶传雄、符永进、邢曙光、符风莲、胡天曙、王蕾、刘国昌、黄明海、钟少勇、郑朝能、符昌贤、黎家璇等文学新人以前所未有的数量和规模改变了黎族地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他们急迫表达本民族文化 and 现实境遇的意愿空前高涨。作家们有的将多年来的习作结集出版,有的致力于长篇小说创作,进入 21 世纪以来,出版发行的文学著作已超过 40 部,其中长篇小说 10 部。

“但对于一个只有三十余年作家文学发展历史的特定的少数民族而言,这批书面文学成果能够以独立著作的形式面世,无论如何都是具有着某种特殊意义,代表了黎族文学创作的整体性突破,显示出黎族作家文学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①新的历史,是以文学创作中的对“旧的历史”的深刻写照与反思来彰显的。黎族作家文学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黎山魂》,是龙敏的长篇处女作,虽然另一黎族作家黄仁轲也同时出版长篇小说《张氏姐妹》,但《黎山魂》的取材及艺术成就,有足够理由作为黎族作家文学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迄今为止,这是惟一以黎族历史为题材,以清朝末年一段史实作为素材的长篇小说。它正面接触了历史上剿黎与抚黎的“宏大叙事”。这种触及,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也是罕见的。

黎族有语言没文字,长期以来,难于在庙堂发出自己的声音,其灿烂文明被迫边缘化,对黎族的文献记载,无论正史野史,大多充满猎奇、不实、歪曲和歧视,“他者”的描述损害了这个民族的尊严,也显示了“他者”的无知与浅薄,更难在“他者”的文学创作中见到黎族文明的真相。龙敏的意义,在于通过民族自我体认与描述,为当代文学民族题材的创作提供了独异的视角。由此视角出发,或服从这个视角,对民族历史做出的艺术判断与描绘,即便有不够严谨或客观之处,所导致的艺术分寸、文学效果诸问题,比诸视角本身,显然不甚重要了。这也是把《黎山魂》作为黎族作家文学抑或海南岛文学的里程碑、标志性作品的理由。我们至今没有读到一部真正全景式地描写海南岛历史风云的长篇小说,哪怕是某个历史时段的长篇小说。岛民的历史文明及生存状况,我们所知甚少。

比之《黎山魂》,另外的几部长篇小说,或者在语言表述、文本结构、艺术表现诸方面,有较多优点优势,但是,在思想建构、题材选择、人物性格的英雄赋格、少数民族精神观照、塑造人物形象的现实营构、对黎族社会的生存状况关怀诸方面,龙敏的文学功力及历史洞见乃至民族承担,比之其他黎族作家都更胜一筹。

黄明海的《你爱过吗》《色相无相》等四部长篇小说,黄仁轲的《张氏姐妹》《大学那些事》,亚根的《婀娜多姿》等作品也为黎族作家文学开拓了创作视野,他们着眼于当代生活,对现实

^① 王海:《成绩与问题》,在海南三亚“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第 12 届年会暨黎族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

虚浮的一面予以更多的关切,也使得这个作家群在创作的自我指涉上具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三

2013年7月,黎族作家郑文秀的诗集《水鸟的天空》横空出世。在此之前,郑文秀几乎没有公开发表过诗作,尽管他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读广东民族学院中文系时就已组建过文学社团,写作过一些诗篇,后来又担任海南青年诗歌协会副会长,但他热衷于文学组织工作,鲜见发表个人作品。2013年,他在老师郭小东的鼓励下,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水鸟的天空》。诗集甫一出版,便引发了评论家的关注,作品大热。郭小东为之作序,他写道:“这是我读过的黎族作家包括黎族民歌中,最好的诗。我必须毫不讳言地把这种感觉如实说出。”“可以肯定地说,郑文秀的诗已成了当今抒情海南岛、哲思海南岛最好的诗,它已然刷新了我们对黎族文学中诗的现状和诗的传统理解。他的诗作,代表了海南岛诗歌的最高水平。”^①2014年7月,郑文秀又一部诗集《可贵的迹象》出版。李少君、叶梅等撰文评论,高度评价郑文秀的诗歌创作。

继龙敏、王海之后,黎族作家郑文秀的问世,是2014年黎族作家文学的重大事件,其中文学现象隐含义理,启示我们对黎族作家文学的诸多思考与期待。龙敏和王海坚持的民族自觉,是努力以“我说”去抗拒“他说”,建立了民族身分认同之下的文学诉说体系;郑文秀则以长期艰苦的磨砺,在母语思维向汉语表达的语言转换中,实现了一种自主自为的由心灵向语言的转化,依郭小东的说法,是一个重新母语的过程:“这是横亘在黎族作家们以黎语思维却以汉语表达的文化障碍,有的作家一辈子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这便是黎族文学存在的根本问题。”^②郑文秀的诗歌创作,在将近三十年的酝酿准备之后厚积薄发。他从文学创作的各个方面,包括对民族口语与民族思维的修辞,都使黎族的作家文学,实现了跨越式的提升。他把这个民族不为人熟知的哲思与奇诡的想象,形象且形而上的予以表现。

郑文秀在研讨会上的发言《黎族作家应把更多的触角去诠释本民族文化》,很好地诠释了他经年的创作心得,以及对民族文学的期待。他说道:“几千年来发展进程中的每一次体验,每一段回忆,乃至每一种情感,无不流露出这个民族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自身个性本质。这种本质贯穿着生活的一系列元素符号,使我们通过这些元素符号去解开原始祖先们生活的历史密码,并将其伸张和发扬,让更多的人走进这个民族……”^③对自我民族性的发现,是

① 郭小东:《在丘陵中隆起》,《水鸟的天空》,海口:南方出版社,2013年,第1-2页。

② 同上,第1-2页。

③ 郑文秀:《黎族作家应把更多的触角去诠释本民族文化》,在海南三亚“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第12届年会暨黎族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

郑文秀诗歌创作的切入点。他潜游于这个民族的内心,是一种执着于灵魂的行走。他在黎语思维与汉语表达之间,寻找一种不同民族文化表现之间的互通交融。这是民族作家汉语写作的关键之点。他的创作、锤炼与探索,是革命性的。

王海是黎族作家群中至关重要的作家,他兼有学者、作家的双重身分,他把先进的文学观念及犀利的文学批评,以本族人的身分,介入并干预黎族作家的创作现状,他历史地分析了黎族作家群先天的不足与后天存在的问题。他不必顾及民族私情,也无须提防所谓民族歧视的嫌疑,他是黎族作家中对本民族的文化与文学表现葆有一份挚爱同时又持着严厉解剖刀的智者。他在研讨会上以《成绩与问题》为题发言,指出黎族作家群存在的严重问题:“对本民族生活描写的缺失无疑是一种重大的遗憾”,“对本民族生活的文化思考方面也比较薄弱,这是黎族文学未能取得应有的重大突破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又直指黎族作家普遍存在的弊端:黎族作家缺乏自省,“发表了几篇作品,出版了一两本书,便自我膨胀,固步自封,容不得别人批评,这是要不得的。善于反思才能进步。”^①这种清醒的自我审视与批判,在黎族文化学者身上有较多地体现。致力于古体诗词的文史学者叶传雄对黎族作家群的文化状况是清楚明白的,“黎族已有一定人数的作家群,至今已写出一大批文学作品,令人高兴。然而,我们应清醒地看到,黎族作家作品数量是上去了,但总体来说质量还上不去。有些作家没有认真体验生活,在思考不成熟时见啥写啥,写出了一些人云亦云、毫无新意的东西,这样的‘作品’,用批评家的话说尽是垃圾。垃圾人人厌恶,我们何必再去制造垃圾呢?”^②叶传雄作为黎族作家群中不可或缺的成员,他的目光是尖锐的,他的话语也是不留情面的。这样来自内部的文学批评,是这个作家群能健康前行的有力保证。

另一位文化学者高泽强(黎名:昂·德威·宏韬),他对姓氏的还原,也可窥见他对民族文化的执着追寻。他从文化的根部诠释文学的生成。高泽强说:“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黎族文化被视为异邦文化而列入文化同化的对象。相对汉族,黎族属于弱小民族。在这种强势的外族文化面前,黎族的‘自我’存在和外族‘他者’存在的主客体关系是完全被颠倒的。比如黎族自称为‘赛’,但声音极其微弱,最后都被‘他者’的称呼‘蛮’、‘蛮夷’、‘俚’、‘俚僚’、‘黎’等各种带有歧视性的称呼所覆盖淹没。”^③他又指出,黎族文化已走向消亡,黎族文学的任务是重塑黎族文化,“让黎族社会的文化重塑、思想回归、灵魂归位”。“黎族文学若想要在中华民族

① 王海:《成绩与问题》。

② 叶传雄:《努力写出视角独特富有创意的作品》,在海南三亚“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第12届年会暨黎族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

③ 高泽强:《从黎族的民族自觉到文化自觉和文学自觉面临的问题谈起》,在海南三亚“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第12届年会暨黎族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

文学史中占有一定地位的话，黎族文学的作家们必须要做到民族文化自觉和民族文学自觉的高度统一。”^①

黎族作家群自身固有的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的机制和功能，加之强烈的地域群落意识，因此这个作家群的内在生命力是旺盛的。把黎族作家当作作家群来认识，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建立起一个自为的文学军团，这是海南岛文学，亦是中华文学史建构的题中之义。

海南岛自古由两部分地域合成，东南中部山区为黎族苗族回族聚居地，主要民族是黎族，有一百三十多万人口，经济较落后，西北部为汉区，经济较发达。两个聚居区有相对较大的文化差别。1988年海南建省，自治州撤消，建立自治县，文化差别在逐步缩小，历史上遗留的族群板块，在社会变动中有所分离，这种分离在文化牵连与对望中，却产生了更强烈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在作家等文化人中形成了迫切的文化驱动力。这亦是黎族作家群在近年形成壮大的现实原因。国际旅游岛的战略目标，使海南岛在地缘剧变中，其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特别是随着大量黎族原始村落的消亡、黎族文化体系分崩离析、黎族语言区的严重萎缩，被现代化围剿到无路可走的黎族文化甚至连博物馆里都难寻踪迹。面对这样的情况，最忧心的莫过于黎族作家们。黎族文化的不断陷落，促使黎族作家们产生以文学保卫文化的新的动力。

（郭蕤，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文学院）

【责任编辑：刘大先】

^① 高泽强：《从黎族的民族自觉到文化自觉和文学自觉面临的问题谈起》，在海南三亚“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第12届年会暨黎族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